



贵州大学人文丛书

民族文化与社会发展

——贵州少数民族考察手记

曹端波 著



贵州大学出版社

民族文化与社会发展

——贵州少数民族考察手记

曹端波 著



贵州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民族文化与社会发展: 贵州少数民族考察手记 / 曹端波著. — 贵阳: 贵州大学出版社, 2007. 8

ISBN 978-7-81126-009-0

I. 民… II. 曹… III. ①少数民族—民族文化—研究—贵州省②少数民族—社会发展—研究—贵州省 IV. K280.7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33605 号

民族文化与社会发展

贵州少数民族考察手记

著 者: 曹端波

责任编辑: 徐 言 黎 仁

设计制作: 甘地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贵州大学出版社

成品尺寸: 260×185mm

印 刷: 贵阳快捷彩印有限公司

印 张: 11.375

字 数: 224 千 插 页: 2

版 次: 2007 年 8 月第 1 版 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1126-009-0

定 价: 20.5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电话: (0851) 8292951

目 录

民族节日与文化功能 /1

- 一、跳场仪式 /1
- 二、仪式文化的变迁 /3
- 三、文化的资本化运作 /5

旅游与文化变迁 /7

- 一、旅游业中民族文化的真实性 /7
- 二、旅游与社会变迁 /9
- 三、旅游与文化变迁 /10

高坡苗族背牌的象征解释 /13

- 一、高坡苗族的背牌及传说 /13
- 二、射背牌的社会功能 /15
- 三、背牌传说与文化的解读 /17

贵州侗文化浅议 /21

- 一、贵州侗戏仪式解读 /21
- 二、贵州侗戏中汉文化因子 /23
- 三、贵州侗文化的多元性 /26

铜鼓纹饰及船纹中祭祀文化 /29

- 一、铜鼓纹饰 /29
- 二、船纹中的祭祀船 /32
- 三、铜鼓纹饰及阐释 /36

从侗戏看侗族婚姻观念 /39

- 一、侗戏所反映的婚姻限制与反抗 /39
- 二、侗戏所反映的自由恋爱 /42
- 三、侗戏中的女性形象 /44
- 四、小结 /45

苗族祭祀文化浅议 /47

- 一、祭祀仪式 /47
- 二、祭祀文化 /49



三、从祭祀文化看苗族的宗教信仰 / 51

苗族牯藏节的文化与功能 / 54

- 一、牯藏节的起源传说 / 54
- 二、牯藏节仪式 / 56
- 三、“牯藏节”文化的阐释 / 57
- 四、牯藏节的文化功能 / 59

理性的小农 / 62

- 一、小农经济方式及收入 / 62
- 二、农民经济的经济分析理论 / 64
- 三、反排苗族农民的经济理性 / 65
- 四、反排苗族农民的非理性分析 / 68
- 五、小结 / 71

文化的断裂 / 73

- 一、土地转移与失地农民 / 73
- 二、生计方式的改变与社会适应 / 74
- 三、招龙仪式与文化的追求 / 75
- 四、文化的断裂与传承 / 77

苗族理词的社会教育功能 / 78

- 一、传承民族传统文化 / 78
- 二、男女关系的定位与婚姻纠纷的解决 / 79
- 三、民事纠纷的解决和教育 / 80
- 四、理词的文化教育功能 / 81
- 五、结语 / 82

少数民族农村法律秩序的选择 / 83

- 一、苗族习惯法 / 83
- 二、习惯法与国家法运行状况 / 86
- 三、少数民族农村法律秩序的选择 / 88

寻求秩序 / 90

- 一、民族伦理价值 / 90
- 二、民族习惯法与秩序 / 93
- 三、社会规范与秩序 / 96



~ii~

四、小结 / 99

生态环境与社会和谐 / 101

- 一、民族文化与环境 / 101
- 二、民族经济开发与生态环境 / 105
- 三、民族生态与社会和谐 / 109

耕作模式与民族生态 / 111

- 一、耕作模式的改变与粮食产量的增加 / 111
- 二、生态环境的恶化与经济收入的减少 / 112
- 三、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 / 114

苗族分类文化与生态环境 / 116

- 一、苗族“人”的分类 / 116
- 二、事物的分类 / 118
- 三、分类民俗的文化与生态意义 / 120

人口与民族经济发展 / 123

- 一、民族生育文化 / 123
- 二、人口与经济类型 / 126
- 三、人口控制与生态农业 / 128

贵州少数民族传统人口控制机制 / 130

- 一、贵州少数民族的婚姻限制 / 130
- 二、生育控制 / 132
- 三、生态资源与人口控制 / 134

民族文化与社会性别 / 137

- 一、布依族女背兜涌入都市 / 137
- 二、文化习俗与女背兜 / 139
- 三、女背兜的生存与发展 / 140

现代化与民族妇女 / 143

- 一、现代化与贵州民族地区生计方式转型 / 143
- 二、贵州少数民族妇女生计方式的转型与社会地位的变化 / 145
- 三、民族妇女的现代化 / 148



民族传统文化与妇女权力 / 149

- 一、民族传统文化中的妇女 / 149
- 二、现实中民族妇女状况 / 151
- 三、民族文化传统与妇女处境的改善 / 153

从清水江下游林业开发看国家与民间力量的互动 / 154

- 一、清代对清水江流域木材的征派与砍伐 / 154
- 二、民间社会与国家的调整 / 156
- 三、民间社会的变迁 / 158
- 四、小结 / 160

民族的建构与解读 / 161

- 一、民族起源的经济因素 / 161
- 二、民族的“分类”基础和动员功能 / 165
- 三、民族与民族主义的解读 / 169

后 记 / 174



民族节日与文化功能

——以旅游开发中的“跳场”为例

节日文化是民族传统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和途径，在现代进程中，一些民族的文化特征逐渐淡化，但在节日里，其内容的文化心理得以张扬。马林诺夫斯基功能学派认为文化是一个整体，任何文化现象都应置于整体中去考察，每一种文化都有着其特定的功能。民族节日文化是一个民族传统文化以及民族特征的最为集中的表现，在节日里，一个民族的传统文化往往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宣扬。人们正是在节日里，习得自己本民族的传统文化，了解本民族的特征。文化在现实生活中，总是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克莱德·伍兹认为：“文化变迁通常是指一个民族的生活方式所发生的任何变更，不论这种变更是因为内部的发展所引起，或者是由于不同生活方式的民族之间的相互交往而产生。归因于内部发展的变迁往往追溯到发明或发现，而归因于外部发展或交往的变迁则常常追溯到借取和传播。”^①

贵州西部的苗族对于跳场十分重视，在节日里，人们穿上盛装，男女老幼一群群到花场尽情歌唱。这一文化不仅为青年男女提供自由恋爱的时间和场所，而且有助于苗族传统文化的传承。文化的功能随时代的变迁而变化，节日文化因民族传统文化的集中性，因而其功能的变迁更为引人注目。每一种商品都是特定文化所创立的一个文化符号，“从而这种商品价值的实现就是这种商品代表的文化以一种符号形式实现了自身的社会意义，那么对于包含了更多的具体符号的较大符号或者说符号系统的认识，就是对包含了更多的社会意义的文化商品的更加深入的理解”。^②人们在经济大潮中，日益看到了文化的经济功能。由于节日文化所蕴含的文化特征，人们往往利用节日文化有意识地将文化作为商品展示出来，以求得其经济功能。反映在贵州一些苗族地区的跳场节日，其文化的社会功能由于社会结构的变化，经文化的资本化运作逐渐彰显了其经济功能。

一、跳场仪式

跳场在苗族中较为盛行，爱必达《黔南识略》曾记载花苗的这一习俗：“男子力耕，妇人以织麻为事。病不服药，小疾则宰鸡，病剧则宰牲屠牛，病愈乃止，孟春合男女于野，谓之跳月。择平壤为月场，以冬春树一本植于地上，缀以野花，名曰花树。男女皆艳服，吹芦笙踏歌跳舞，绕树三匝，名曰跳花。跳竿，女视所欢，或巾或带与之相易，

^① [美]克莱德·伍兹：《文化变迁》，云南教育出版社，1989年，第1页。

^② 马骅炜、陈庆德：《民族文化资本化》，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88页。



谓之换带，然后通媒妁，议聘贐，以妍媸为盈缩。女嫁数日，即回母家，生子然后归，曰坐家。”民国《平坝县志》也记载了苗族的跳花：“大致选一广场，场中植一树，名曰：‘花树’，如有场主者，场主坐树下，更坐场主邀请之来宾。无场主者，则否。苗男女衣新衣，徐徐而来。来齐，苗女牵手作无数之小环围树外，各男女父母及观看、售食物者，又包围于外。每小环约十许人。环中二苗，男携芦笙吹之，环女随声踏步，和其节奏……约半日而罢，率多继续三日。其由小环变大环时，女手换男带皆随所值而着手。在女方，不许故意弃取，在男方，不许回头反顾。因各皆有父母监督，而又皆未婚嫁之男女也。然细察之，男女之目标率皆先定，挽时不相左，故男方辄引为荣焉。”

跳场起源于什么时候，为什么苗家举行跳场，其历史事实难以弄清楚，在苗族流传着一些传说故事以说明跳场的起源：有一老人有两个女儿，因摘了家里的黄瓜给一个青年吃，老人回来后姑娘害羞不敢把实情告知老人，老人因此说：“哪个摘了我的黄瓜，老虎就要咬他。”两个姑娘说出实情，但话已出口，老虎在晚上果然来咬姑娘，最后在青年的帮助下，挽救了小女儿。老人为了找到救命恩人，于是设跳场来寻找。青年来跳场，老人把小女儿嫁给他。自此，苗家每年都举行三天跳场来纪念这事。也有传说讲述，因为苗家各村寨相隔较远，人们很难交往。有一户富裕人家儿女较多，因此与外界交往少难以找到称心的人，因此人们想出跳花场的办法。^①也有传说将苗族姑娘在正月初一到初三，不能在家中动针线。因此，姑娘们都聚集到山野村边去挑花绣朵。有一年正月初一，一姑娘在家园附近绣花，一野雁精惊下了姑娘，回家后就生病了。有一个青年打死了野雁精并把肉炖给姑娘吃，姑娘恢复了青春活力。姑娘对青年产生了爱情，自青年回家后，再也找不到那个青年。如是在春节闲时（初一至十五），在寨中立一花杆为标志，召集各寨男女来吹芦笙、对歌、跳舞，这样就可以让姑娘找到那个青年，最后姑娘与青年终成眷属。为了纪念这次活动，每年正月这段时间，都要立起花杆，四方群众来聚会吹、跳、唱。^②

民间传说与仪式之间有两种：先有传说再有仪式，先有仪式再有传说。从跳场普及滇黔川苗族看来，应属先有仪式再有传说，跳场的传说是为了加强跳场仪式的作用和功能，有利于巩固和推广传承这一仪式。

花溪桐木岭跳场在正月初一、初二、初三举行，在正式跳场前一日，就要举行踩场仪式，踩场要由一男子在附近砍一颗长青树来做花树。花树栽好后，由当地青年吹芦笙绕树走几圈。正式花场来临时，远近的人们都赶来参加，有的甚至要走一天的路程，可见人们对花场之重视。参加跳场的以青年男女居多，一般是吃完早饭，打扮整齐后来花场进行跳场。小伙子在腰上挂一条大腰带，姑娘们手持带子，这是在跳场时为了好“牵羊”。在跳场之前，有些小伙子就到处寻找“牵羊”对象，而更多的是在互相交往中，人们结成一对对，每人找到自己所要“牵”的姑娘。在跳场上，经常看到一群小伙子（3

^① 贵州省编辑组编：《苗族社会历史调查（三）》，贵州民族出版社，1987年，第81、82页。

^② 贵州省文管会办公室、文化厅文物处、中央民族学院民族学系、民族研究所编：《贵州节日文化》，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8年，第335、336页。



—5人)和一群小姑娘聊天,小姑娘们牵着手很少说话,只是偶尔问一下其中的小伙子,而小伙子们夸夸其谈。小伙子有了中意的姑娘后,总是跟在姑娘后面,尽量找借口与之交流。也有的姑娘看中小伙子后,就委托亲友前去征询小伙子家意见。跳场开始后,小伙子们吹着芦笙围着花树走,姑娘们随着芦笙的节拍跳起了苗家舞。在跳场高潮中,姑娘们把手中的带子插在自己中意的小伙子的腰带上,牵着带子跟随小伙子围绕花树跳舞。男女青年经过“牵羊”后,互相有了了解。如果双方满意,在跳场结束后,两人就算是“朋友”了,可以互相来往。在交往过程中,产生了情感的,男方就央媒人提亲。也有地方“跳花场”要举行“抢羊”活动,即由一小伙演“护羊人”,一小伙演“抢羊人”,“抢羊人”要从“牵羊人”手中抢走自己中意的姑娘。

从跳场的传说与仪式的举行来看,跳场的文化功能是为了加强苗家青年男女的交流。使男女青年找到心中最为满意的对象。川黔滇方言所属苗族在居住上极为分散,有的苗族只是一个家族聚居在一个偏僻的山坡上。在古代要想认识外面的人很难,而且有的苗族四邻都是外族,苗族有限制民族间通婚的习俗。为了使社会正常运转,苗族社会不仅要鼓励自由恋爱,而且还要专门为青年男女设置恋爱的时间和场所。这样,在规定的时间内(一般在春暖花开的日子,人们正处农闲时,气候也好),苗族青年男女举行一次大的交友集会。在集会的过程中,不仅青年男女可以尽情地愉悦,寻找自己心中满意的对象;而且父母往往也来参加,为自己子女寻找最称心的对象,有的父母来到花场后,还到处打听对方家的情况。

跳场仪式的举行是当地苗族所独特的居住状况所决定的,也正是跳场维系了单个山寨与外界的交往。花场不仅起到了青年男女之间的交流和了解的功能,而且起到了寨与寨之间来往的功能。苗家人也正是在这一仪式中加强了自身民族的认同。“远亲胜比近邻”,由于近邻可能是“他者”,举行跳场仪式将苗家人的情感又栓在了一起。跳场是苗族盛大的节日,是其民族文化的一次集体展示,在古代交通不便的情况下,有的苗家人不辞旅途劳苦,宁愿走几天的路也要到达花场进行跳场。

二、仪式文化的变迁

跳场这一节日活动,其民族的特征在节日得到了集中的展示;小伙子吹的芦笙,跳的芦笙舞,姑娘们鲜艳的盛装等。而且各种传说故事也在这一节日里被人们所吟唱、叙说。苗族的跳场有其文化功能,是苗族生存状况获得延续的重要一环。在现代化的过程中,苗族所居的环境、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许多青年男女远赴城市打工,与外界的交流增多;近几年由于交通的发展,寨与寨、村与村之间的交往加强;最为重要的是,很多苗族青年打破了民族间通婚的限制。这样,人们的交友通婚圈以另一种方式进行。在城里打工者一般是在打工所在地找到朋友;在家乡的也由于信息、交通的发展,平时人们很容易找对象,不必像过去一样需要在跳花场时寻觅朋友。当然,目前花场仍有为青年男女找对象的功能,只是这一功能被无限削弱。跳场时,一对对青年男女是早就在平



时“牵”上的，来花场是为了娱乐。

现代化的发展，文化的资本化也渗透到苗族跳场活动之中。俗话说：“文化搭台，经济唱戏”，跳场的文化功能由于社会结构的变迁其自身功能也出现转型。跳场在这一资本化运作过程中，其民俗文化展示功能得到加强，苗族青年男女进入花场的目的便是表演，以展示其民族传统文化。现在跳场的举行不同于过去的是文化的展示性更强，参加跳场的不仅是苗家人，更为重要的是“游客”，愿意为此文化的展示付费的人。“游客”的加入是跳场这一仪式功能出现了转换，游客在参观这一“异域”文化的过程中获得了一种心灵的享受。游客在旅游时，面对这一“奇风异俗”，并不想追问其是否真实，他们追求的是一种猎奇式的“异域风光”。其民族文化展示的原生态性质，他们并不关心，他们关注的是是否真的“好玩”。正是这一文化的“误读”，文化展示者与游客之间形成了一种默契，展示方尽量以奇异艳丽的形式来吸引游客的眼球，游客以“误读”的方式获得了心中对一个“他者”文化的理解。

在旅游业中的跳场，经济的因素在文化转型过程中影响越来越大。跳场所参与的主体已由苗家青年男女变成了各民族所组成的“游客”，苗家姑娘穿着艳丽的盛装出场参与这一跳场是为了向“游客”展示这一美丽的风景，为参与主体“游客”服务。在跳场之前，场地上一群苗族少女举杯向游客敬酒，当游客通过这一道“拦门酒”后，跳场才正式开始。在跳场过程中，还增加了许多苗族歌舞节目。最后是苗族少女们将游客拉到跳场中心，牵着自己的“羊”翩翩起舞，在共同的欢庆中完成了这一文化的展演。旅游业中跳场仪式的举行出现了另外一种形式的双方，即由苗族青年男女双方转换成苗族青年男女与游客双方，苗族青年男女在表演完增加的歌舞节目后，与游客共同完成这一跳场仪式。这一节日的举行，对于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承，民族文化的认同仍具有深远意义，只是参与的主体被无限扩大，使外界加入到这一节日中来，不仅成为苗族的节日，也成为了参与者共同的节日庆典。

旅游是因为人们都想有一种好奇心，以满足自己的奇思异想，用此来补偿周围熟悉环境的单调和不足之处。对于游客来说是一段神圣的旅程，格雷伯恩认为：“每一段世俗或神圣的阶段，就是一段微观的生活，有着良好的开始、过程和结局，这些‘生活’的开始和结尾都以仪式作为标志，这些仪式都是贯穿在我们的生命历程里……我们的两种生活(神圣的、非一般的、旅游的生活和世俗的日常的呆在家中的生活)对于普通人来说一般是交替性的，往往以仪式作为标记，标志着生命的开始和结束。”^①人们在过渡性礼仪中是严肃认真的，充满了危险，而在旅游中，从世俗生活过渡到神圣的旅游，是轻松的、愉快的。对于游客，花了大量的钱获得了一种精神文化的享受，忘却了日常生活中的琐事，使疲惫的心灵得到了休憩。旅游结束后，得到修整的精神再次投入工作中，缓解了人们对工作的焦虑和压力。因此，游客的旅游是一种享受，是一种神圣的精神之旅。

在旅游业发展中的节日文化，一方面要吸引游客，使游客得到一种精神享受，又要

^① 纳尔逊·H·格雷伯恩：《旅游：神圣的旅程》，载[美]瓦伦·L·史密斯主编：《东道主与游客——旅游人类学研究》，云南大学出版社，2002年。



注重其产业的可持续性。有的地方出现“千节一日”的局面，什么节日都是相同的，没有特色。只有在发展旅游业的同时，保持自己节日文化的特色，才能真正创造良好的品牌。

三、文化的资本化运作

在文化资本化论述中，陈庆德认为：“认识民族文化资本化的可能性既生成于‘边缘’参与‘主流’的过程中，也强调了不同的民族共同体只有在‘参与’中才能获得自我保护与生存的基本条件，也就是规定了‘边缘’参与‘主流’的必然性和必要性。那么，仅仅认识到‘参与’的问题，并不能保证民族文化资本化的可能性成为现实，并不能保证实现民族文化这种特殊性向普遍性的提升。这就提出了如何参与的问题。如何参与问题的重点，不在于参与的形式，而在于参与的目标要求。”^①在全球化、现代化发展的今天，一个民族要维护自己的传统文化，只有参与到民族文化资本化这一浪潮中，才能真正获得本民族文化的保护和传承。为了保持本民族传统文化，试图将其封闭起来、隔绝起来，收藏在“博物馆”里只能是适得其反。贵州省黔东南雷山县朗德寨正是因为加入到这一文化资本化运作中，才使得其苗族村寨特色文化保存得更完整，而与之更为偏僻的一些苗寨，其民族传统文化的因子由于现代化的冲击已经荡然无存。但仅仅只认识到“参与”，还不足以保证其文化能够资本化，怎样参与资本化运作则是首先必须解决的问题。

人类学对人文学科的重大贡献就是其所阐发的文化概念人类学所理解的文化是一个由社会-历史规定的并从内部塑造而成的象征系统。许多人类学家试着阐发了意义集中的、未被简化过的并且立基牢靠的文化概念、阶级概念与社会结构概念。^②布迪厄对资本、场域与象征权力概念的论述阐发了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布迪厄认为资本依赖于它在其中起作用的场域，而它转化的代价多多少少是昂贵的，并且是它在有关场域中发挥作用的先决条件。资本可以表现为三种基本的类型：1. 经济资本，这种资本可以当下直接转换成金钱，这一转换过程是以私人产权的形式制度化的；2. 文化资本，在某些条件下，这样资本能够转换成经济资本，这一转换过程是以教育资质的形式制度化；3. 社会资本，它由社会义务所构成，在一定条件下也可以转换成经济资本，而这一转换过程是以某种高贵身份的形式被制度化的。文化产品既可以表现出物质性的一面，也可以表现出符号性的一面。^③在这里，布迪厄将资本分为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而文化资本、社会资本需在一定条件下才能转换成经济资本。对于文化产品，其既有物质属性又有文

^① 马翀炜、陈庆德：《民族文化资本化》，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2页。

^② [美]爱德华·李普马：《实践理论中的文化与文化概念》，载薛晓源、曹荣湘主编：《全球化与文化资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

^③ [法]皮埃尔·布迪厄：《资本的形式》，载薛晓源、曹荣湘主编：《全球化与文化资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



化属性，是文化与物质的结合体。

在后工业时代，人们为了消费而购买的商品，并非只购买其商品的使用价值；在后现代消费中，文化的因素越来越重要。英国学者迈克·费瑟斯通认为，消费文化是后现代社会的动力，以符号与影像为主要特征的后现代消费，导致了艺术与生活、学术与通俗、文化与政治、神圣与世俗间区别的消解，也产生了符号生产者、文化媒介人等文化资本家。^①任何产品都是特定文化的产物，具有符号性。经济不仅与生产力、生产关系有关，而且与文化有关，一切经济制度的制订和实行都是在该民族整体文化体制下实现的，在消费时代，商品的使用价值与价值的界限逐渐模糊，人们在消费某一商品时，背后潜藏着本民族的文化因子。

在少数民族经济发展方面，我们不能只看到物的表面性而忽视其文化特征。对于少数民族文化的资本化运作时，即将文化资本转化为经济资本时，既要使之符合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也要遵循文化资本转换为经济资本的内在规律。正是这一要求，人类学与经济学进行对话愈显重要，在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必须看到文化的因素，在文化的保护和研究中看到经济的因素。经济人类学也正在这一需求下产生了。

对于贵州少数民族节日文化，如苗族的跳场，由于社会结构的变化，其原有的功能和存在的环境逐渐衰落。怎样挽救保护这一民族文化传统，将这一文化进行资本化运作不仅可加强民族文化的保护，而且可将民族文化转化为经济资本，让游客购买跳场文化符号，即旅游消费，用所获得的经济资本维持跳场等文化活动所需的资金。节日文化在资本化运作过程中，不能只注重形式，而应强调其目标要求；不能只求短期的经济回报，而应着重于将来，着重于文化的保存与开发。正如陈庆德所说：“只有在此前提基础上，我们才不至于把‘民族文化’的整体性概念化简为具体的文化形式或项目，而提出哪些形式可以得到资本化的运用或哪些则不能的问题；才能在面对民族发展和民族文化保护等问题时，能够提出‘发展谁，保护谁？’‘为谁发展，为谁保护？’‘谁来发展，谁来保护？’等深层的追问与思考。”^②民族文化资本化的核心和主体是该文化的所有者即该民族的人们，游客只是消费群体，是一个流动的过客，消费后的一切均需该文化的人们来负责。由此，在民族文化资本化运作过程中，该民族的文化由谁保护，由谁发展；为谁发展，为谁保护便一清二楚。



^① [英]迈克·费瑟斯通：《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译林出版社，2000年。

^② 马翀炜、陈庆德：《民族文化资本化》，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4页。

旅游与文化变迁

——关于贵州民族文化旅游的考察

旅游是一种休闲方式，既有经济因素，又有文化因素。只有当人们具有一定的经济实力，才可以不受经济条件的制约离开自己的居地和工作岗位到外面去旅游。旅游除经济原因外，促使人们离开熟悉的环境到外地旅游的重要原因是文化因素。游客旅游最为看重的是一种文化体验。游客进入旅游的目的地，并感受体验另一种文化。这一过程不仅对旅游者造成文化的震撼，而且旅游者必然会对旅游目的地产生文化影响，从而导致旅游目的地文化的变迁。

对于旅游带来的文化问题，有两个极端的假设：（1）“游客世界”：这儿旅游导致了整个社会文化改变，旅游追随游客群体模式构建。（2）“土著世界”：这儿没有发生任何改变，生活与从前一样^①。这两个极端的假设只是一种“假设”，文化的变迁不可能随游客群体模式构建，也不可能保持传统毫无变化。文化是旅游业发展的重要资源，如何有效地保持、开发文化传统，使旅游充满活力，是目前贵州民族文化旅游的当务之急。

一、旅游业中民族文化的真实性

许多游客对旅游目的地文化的展示经常有文化的真实性问题。真实性的概念在民族旅游业中与传统的概念紧密联系，“实际上，大多数旅游者真正看到的是旅游目的地的人们所过的‘真实的生活’，而不是寻找更多的‘传统的真实性’。换句话说，旅游者所感兴趣是与‘他者’相区别的东西，他对观看‘本地人’过‘传统的真实生活’感兴趣，因为这与旅游者的现代生活存在很大不同。在民族旅游业中，这将导致对民族特征，特别是对表现‘传统’的民族特征的‘表演’”^②。旅游者之所以来目的地，是为了看到与自己文化不同的一个“他者”，而对这个“他者”充满了期待和想象。如果旅游目的地达不到游客的期望，尽管让游客体验到了一个相对的真实，但是必然导致游客的不满意。因此，旅游目的地居民在与游客打交道的过程中，必然按照旅游者的期待给其表演，“这样做的结果存在着这样的不同，即旅游者观看到（在公众场所）的‘前台’生活和当地人不在表演时的‘幕后’生活的不同”^③。这样，在民族文化旅游区，出现了两个不同的空间：

^① [美]瓦伦·L·史密斯主编《东道主与游客》，云南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30页。

^② [加]康森：《谁的真实？——对来自地方性的观念的反思：以中国少数民族为例》，载杨鬃、王良范主编：《苗侗文谭》，贵州人民出版社，2006年。

^③ [加]康森：《谁的真实？——对来自地方性的观念的反思：以中国少数民族为例》，载杨鬃、王良范



旅游空间（前台）和生活空间（幕后）。前台是游客与目的地居民共同表演的舞台，这一舞台不只是单纯的当地人表演，游客观赏的舞台，而是演员们按游客所期待的一种“他者”的表演。幕后的当地人生活空间，可以说是当地人真实的生活，但这一真实生活或多或少要受前台的表演生活所影响。当地人整个生活空间即由这一前台与幕后构成，旅游者正是通过前台使幕后民族文化的传统得以变迁。后台对一个社会或一个组织维持社会团结极为重要，一个人能否成为一个社区中的一员，是否能与本社区达成默契，将其视为朋友或内部人，并与之一起共同生活，其最为显著的标志就是本地人能否与其共享“后台”。这种共享，其实质是允许其观察他们真实的生活，前台是一个舞台空间，后台则是当地人的真实生活。随着前台文化展示空间的日益发展，必然对后台人们的真实生活发生转变；而后台的真实生活又是前台舞台空间艺术的源泉。当地人在这一前一后两个空间构成了他们完整的生活，其前台的表演，也是其生活的一部分。

近年来，贵州民族文化旅游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不仅建立了梭嘎等一系列“生态博物馆”，而且节日旅游等正方兴未艾，如雷山的苗年节、松桃的“四月八”、花溪桐木岭的跳花、黎平的侗族大歌等。文化旅游是目的地为旅游者在前台的一次文化展示，这一文化必须具有一定的文化真实性，即来源于传统，但又不可能等同于生活的真实，它毕竟是一次文化表演。如雷山县郎德上寨由于保存了完好的苗族传统建筑，吊脚楼特色浓厚，生态环境保护得很好，在1980年代开始发展乡村旅游业。游客进入郎德上寨，当地人将在鼓场为游客表演盛大的民族文化。这一文化表演只是与游客在前台的一次共演，并不是郎德上寨人真实的生活。按苗族传统文化，在平时是严禁敲铜鼓、吹芦笙的。为了吸引游客、满足游客的心理期待，组织一场精心设计的文化表演将有助于旅游业的发展。而这一禁令的打破，必然对传统的苗寨生活发生重大影响。至少，郎德上寨再也不可能回到过去宁静的生活，商品的大潮必然随之涌入。

随着旅游业的发展，文化的变迁必然在所难免，“所有文化都会在某个时候因不同原因而发生变迁。尽管人们会针对一些看得见的问题有意改变他们的应付方式，但很多变迁是偶然的，其中包括当前事件可能会产生的一些不曾预料到的结果。或者，与其他民族接触也会引入‘外来的’观念，导致现存价值和行为的变化。这甚至可能包括，因为一个群体被另一个群体征服而大量强加的外来的习俗。文化通过变迁能够调适改变了的环境；但是，并非所有的变迁都是调适性的^①。一个社会不可能保持其传统不变，况且很多传统并非总是源自过去，“尽管传统的维护者这样声称，它可能是针对新出现的情况而发明的，通过向过去溯源而为现在的情况辩护，为了将新出现的情况纳入文化的连续性中，常用的方法之一就是发明传统”。^②促使文化的变迁既有内部原因也有外部原因，当一个民族的生境出现变化时，其社会必然对新的情况作出反应。文化的变迁的机制有创新、传播、文化遗失和涵化，而文化在变迁过程中是一个选择的过程。如在文化传播中，

主编：《苗侗文谭》，贵州人民出版社，2006年。

^① [美]威廉·A·哈维兰：《文化人类学》，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年，第419页。

^② [英]肯尼斯·麦克利会主编《人类思想的主要观点——形成世界的观念》（下卷），新华出版社，2004年，第1465页。



一个社会与另一异文化在交往过程中,其对异文化的传播要看其文化对其本身是否有用。如苗族居住在崎岖不平的山区,在与汉民族的长期交往中,也不会接受骑自行车的文化。因此,完全的随游客群体文化模式构建的变迁也不可能产生。

由此,旅游目的地的民族传统文化,在旅游业开发中,其文化的变迁是必然的。这样,怎样既发展旅游业,又要保护民族传统文化的呼声就产生了。在民族文化传统的保护方面,我们最核心的是要弄清谁保护、保护谁、为谁保护的最为深层的问题。如果一个民族的生境发生变化,其自然要求文化通过变迁以能够调适于已经改变了的环境。如苗族的姑舅优先婚,禁止与不同民族结婚,禁止与不同服装的支系通婚等即没有现实意义了。在追求现代丰富物质生活的人们没有资格也不可能要求边疆少数民族保存他们原始的生产方式和贫困的生活。贵州少数民族在民族文化旅游中不可能被动参与,他们的积极文化展示,即是对其民族文化资本化的一种运作形式。

二、旅游与社会变迁

旅游业为贵州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带来了活力。郎德上寨2003年共接待306批游客,村集体旅游现金收入就有19.8926万元,用于村民分配12.382万元,户均旅游收入1000元左右。^①目前随旅游业的发展,其旅游收入越来越高,成为郎德上寨的重要经济支柱。在旅游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必然带来社会的变迁,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导致了贫富不均。在郎德上寨,有的家庭能挣到大量工分,而有的家庭则很难。最为显著的是在农家乐和住宿方面,有的家庭房子多,设备好,会弄吃,吸引了大量游客,而有的家庭只能看着其他家庭赚钱。原来共同贫困的村寨被一批先富起来的家庭所打破。

旅游促进了经济发展,经济发展使当地人有资金改善环境。如郎德上寨、千户苗寨西江、南花村等在旅游经济带动下,其生态环境更加优美,卫生状况得到了较大改善。目前,西江正在大力发展沼气,这大大节省了村民们砍柴花去的时间,也有利于维护周围的林业资源。郎德上寨不仅对道路加强了维修,而且设立许多垃圾箱,要求村民自觉打扫各自家门口分段的卫生。

旅游打开了民族村寨的封闭性,使其直接面对市场。在外来人看来,一些封闭的民族山民在经济上十分保守,没有理性,认为贵州少数民族宁愿吃喝玩乐,也不想发财致富。其实这是对贵州少数民族的一种“误读”。贵州山地多,少数民族在有限的土地上无论怎样勤奋也难以发家致富,况且贵州少数民族一般是在节日共同玩乐,并非如外人所说的整天玩乐,而这些节日一般均在农闲季节,是劳作后的一些休闲形式。外界对贵州少数民族的“误读”,正如萨伊德所说的“东方主义”,而这一形式可看作“内部的东方主义”。游客来到民族旅游区看到的只是贵州少数民族的“前台”,其真实生活的“幕后”并没有被游客所注意。正如许多人一提到少数民族,脑海里就浮现一群打扮十分艳丽载

① 石声德、石声礼:《乡村旅游与社区生计策略反思》,载杨髫、王良范主编:《苗侗文谭》,贵州人民出版社,2006年。



歌载舞的少女形象。“前台”是按游客所期待的来进行表演，我们到贵州民族旅游点确实到处是一群着盛装的少女。贵州少数民族是否有经济理性，这必须进入“幕后”，深入了解当地人的真实生活才能得出正确的回答。

贵州少数民族对于市场经济并不排斥，他们在旅游投资和运营上并不比理性的城市市民差。在郎德上寨，一有接待游客的任务，村民们便放下手中的农活来“前台”进行文化表演；无接待时便安排好家里的农活。在劳动力的投入方面，怎么得到最大的经济成效，在对郎德上寨的考察中发现，这些苗族山民们是十分具有理性的。有的家庭男劳动力外出到城里打工，女劳动力在家从事旅游；在旅游与农活投入的分配方面也十分合理。旅游的经济效益好，因此村寨将旅游放在第一位，人们从事农业，只是在没有接待任务的情况下。村民们对旅游商业利润的计算十分精确，以寻求使用劳动力的最佳配置方案。如有的家庭老太太从事旅游品的推销，小孩从事表演，青壮年出外打工等，有的家庭从事农家乐，专门从事接待游客。其安排是完全根据家庭情况，是为了获得最大边际收益的一种合理选择。

旅游业的发展带动了民族地区经济的发展，并导致了社会的变迁。千百年来，一直从事土地经营的农民开始面对市场。旅游业的发展对传统社会结构的冲击是无法避免的。在传统农业生产中，男人只属于男人的活，而女性不仅要包揽所有的家务即女人活，还要从事一些田间劳动。旅游业的发展，具有经济理性的农民必须把家庭劳动力放在经济收益最佳的配置上。有的家庭女性从事旅游业能挣到更多的钱。因此，让家庭妇女从“女人活”中解放出来，男人则心甘情愿地干起“女人活”，在家带孩子和做家务。当然，旅游业的发展对民族旅游点最大的冲击是造成了贫富不均，原有的平衡结构模式被打破。



~10~

三、旅游与文化变迁

旅游业对贵州少数民族文化的影响是深刻的。贵州有着独特的气候和人文景观，其民族文化的多元性、独特性吸引了大量的游客。在贵州，越来越体现到全球化的趋势，许多较为偏僻的民族村寨都有外国的游客来访。贵州不再是一个封闭的、自给自足的经济体了，一个开放而充满活力的贵州新形象崭露头角。旅游的发展不仅促进了社会的变迁，也必然导致文化的变迁。

贵州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变迁在所难免，目前我们要关注的是怎么变迁的问题。文化通过变迁能够调适于已经改变了的环境，但并非所有的文化变迁都是调适性的。民族传统文化不可能一成不变地如博物馆的古董保持永恒，文化是充满活力的，与民族生境是息息相关的。民族传统文化是贵州旅游的重要资源，只有有效地保护这一资源才能使贵州旅游业具有可持续发展。如何保护？由谁保护？保护谁？为了谁？这一系列深层问题是民族文化旅游的核心问题。

在旅游发展与民族文化的保护上，这两者并不是完全对立的。由于现代化进程的影响，贵州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结构出现转型，其传统文化出现变迁，年青一代出外打工的